



如沐春風

崩世代陰影下的大學通識教育

● 方中士*

被新馬批評理論學者奉為經典的《獄中札記》（葛蘭西，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一開始便指出知識份子成為統治集團意識型態傳播工具的角色與位置。這雖然凸顯了知識份子作為有選擇性知識傳播者的面相，這融入「文化霸權」體系過程，成為被豢養者成為幫凶共犯的可悲困境如何超克？當然是得先承認知識份子有這被工具化的可能，然後至少誠實面對自己在知識生產與權力體系中的既得利益位置，始能清醒著檢視來自統治集團給的價值、典範、教育目標等等。

沒有這點清醒的話，真不知道曾在一黨專政威權統治時期助紂為虐的幫凶如何面對自己的共犯罪行？

想想，不管是小學教師或大學教授，總還算是廣義的知識份子吧！那麼，我們怎麼看待在那威權統治時代打壓、羞辱、孤立黑名單份子子女的種種「怪異」（因為喪失天良到找不到適當形容詞地步）行為？這些至少以「讀書人」自居的教師又如何理解自身所接受與傳播的黨國一體的教條與被篩選過的知識？

我們是不該強迫知識份子個個當與當權者對抗的烈士，在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下的知識份子腦中被置放了「警總」，人人背脊老是覺得有把無形的槍口頂著；於是，別管那髒污的政治成了迴避知識份子責任的犬儒藉口。所以可以把主義、信條、守則、訓詞倒背如流，以此獲得學位、官職與俸祿，終至於讓人模糊了知識份子的形象與價值。等到戒嚴體制解除了，原先的思惟模式依舊，運作政治權力體系的人未變，知識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份子卻仍未從工具化的魔咒中醒來，依舊以能被用為職志，於是，知識份子仍未能看清當權者收起了棒子，捧出了胡蘿蔔，卻仍進行著收編知識份子的手段，變的只是把過去政治意識型態的虛構敵人改為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目標而已。因此，在政權合法性由意識型態的運動領導改為經濟發展成果後，知識份子成為產學合作鏈裡的一環，產值成了知識與知識分子典範的價值指標，所有人被催眠般被驅趕到各種經濟開發的路去。

過去的知識份子要以血肉之軀對抗黨國體制的國家暴力，處境很慘烈，卻可能獲得身後美名；如今，要大夥們從經濟開發的路上轉過頭來檢視官商勾結的共生體系，不用慘烈犧牲卻很是寂寞，沒有美名，有的可能是失敗者的譏諷。經過四十餘年的威權統治，少數幾個知識份子被掃進歷史的昏暗角落，沒進行轉型正義的既得利益者則更進一步的取得知識份子的代表權，以經濟發展取得民主選舉政權的權力，又使知識份子自動轉型為各經濟生產部門技術員，直到經濟發展軌跡走到了自我毀滅的邊緣險境，知識份子才又被逼著站到喚醒大家「旅鼠效應」的位置上來。例如，當 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繼茉莉花革命而起時，知識份子如何評價與判斷其發展？當社會貧富階層發展到突然讓人憶起正義一詞時知識份子是否該教孩子努力別掉入貧窮的那一邊抑或是勇敢的質疑起政府的分配正義？知識份子能否清醒看待自身被收編進知識分工生產體系的工具化位置？

台灣 2011 年 11 月勞工陣線團體出版的新書《崩世代》正是嚴厲考驗知識份子的叫陣怒吼，此書所標示出未來 20 年社會景象所用的「崩世代」一詞，勢必深入正處經濟弱勢者或對未來惶惑不安者內心而取貸「X 世代」、「Y 世代」，也將成為許多人避免提及或使用的犯忌名詞。不過，當現實的經濟景況讓人愈來愈不安，知識份子如何看待那似乎真的日益傾斜的貧富差距？難道知識份子只能充當造成崩世代政經結構的推手與幫凶？比方說，明知不斷自肥而壯大的軍公教利益集團是國債高築到導致國家財政破產的肇因之一，也明白想要進入此終身有保障體系者卻須冒錄取率不斷創新低的極大風險與社會得承擔付出虛耗大量青年寶貴創造力的代價。在此明顯會危及後代子孫的趨勢下，知識份子是要以其專業知識繼續鼓動這風潮，欣羨的予以推波助瀾者，而沒能悍然警告不斷自肥而壯大的軍公教集團正是制造更多人掉入不斷擴大的貧窮人





口的制造者。

也就是說，當國家財富畸型的集中於百分之一的人身上時，年青人被誘引被暗示往上爬的社會成就斜坡已陡到令人失去對未來的希望時，知識份子該怎麼看待自己的社會責任？債留子孫？然後知識份子想法移民到尚未破產的國家？是憂慮少子化帶來的衝擊抑或是思考如何解決年青人生養不起小孩的政經因素？是眼睜睜的看著年輕學生步入起薪低或到處是非典型就業的職場抑或是早些教導學生街頭抗爭運動的必備教戰守則與技巧？早些讓學生明白勞工人權從不靠資方施捨的歷史知識？知識份子在「崩世代」陰影下是要帶領社會轉向陽光處，抑或是繼續鼓動學生往那日益傾斜的坡頂爬？以一個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往下看著，無助的看著滾跌下窮忙族、過勞死者、無薪假族、約僱工、派遣工的人頭？在「崩世代」的陰影籠罩下，智識份子該如何找回勇於不爬那人為斜坡的人，然後一起用力拉平社會階層，一起再擁抱正義？

這裡所指的知識份子，廣義的說，指的當然是廣義的「讀書人」，但，大學裡的通識教育課程教師是不是更符合這期待呢？

